

现象级文旅火爆与乡村韧性 ——基于贵州“村超”的个案研究

秦昊洋¹, 王通¹, 赵蓬舟¹, 林栩俊^{2*}

(1.深圳大学, 广东省深圳市, 518060;

2.香港树仁大学, 香港特别行政区, 999077;

* 通讯作者, 22s074@hksyu.edu.hk)

摘要: 韧性乡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社会基础。近年来现象级文旅事件的火爆出圈, 为激活乡村韧性、提升乡村韧性水平提供了机会窗口。基于此, 本文将资源动员理论与中国本土情境相结合, 以贵州“村超”带动乡村振兴的实例为切入点, 深入探究现象级文旅火爆促进乡村韧性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榕江县政府以政治动员为始发动力机制, 通过利益动员、情感动员与教育动员三者协同, 进而升华为以建构“村超”话语为本质特征的文化动员, 最终促成了贵州“村超”的持久火爆。而在动员过程中, 贵州“村超”吸引了各类主体的优质资源, 激活了各类主体的参与动能, 强化了各类主体文化认同, 不仅有效提升了乡村韧性水平, 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长效发展活力。这一发现不仅为理解转型时期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微观关系机制层面的实证证据, 同时也拓展了资源动员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边界。

关键词: 现象级文旅火爆; 资源动员; 乡村韧性; 乡村振兴

引言

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 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生活的根基 [1], 其全面发展对于实现2035年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具有深远的实践价值 [2]。根据乡村韧性观, 在乡村系统的脆弱性与乡村内外愈加复杂的形势之下, 只有通过合理的治理机制提升乡村韧性才能更好地实现乡村振兴, 弥合城乡二元差异 [3]。现有研究对乡村韧性水平的判断存在分野, 多数学者认为, 乡村的发展基础都比较薄弱, 且资源流失严重, 韧性水平较低; 但也有观点认为, 乡村始终保持着较强的“乡土韧性” [4], 小农的生产生活方式使乡村更具韧性 [5], 只是它们的作用在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明显式微 [6]。这一争议表明了各类乡村韧性水平的差异, 同时也反映出激活乡村韧性、提升乡村韧性水平的重要性。

以往研究乡村韧性的学者多认为乡村的经济水平、社会环境与政治参与等造就了乡村发展韧性, 因而它们的低质与低效使得乡村韧性发展能力缺失 [7]。这些观点逐步明晰了乡村韧性的影响因素, 但对其内生机制缺乏深描。而近年来伴随淄博烧烤、贵州“村超”、冰雪哈尔滨、天水麻辣烫以及荣昌卤鹅等现象级文旅事件的火爆出圈, 为深入研究城市韧性、乡村韧性的内生机制提供了机会窗口。其中, 贵州“村超”与乡村韧性尤为契合。目前有关贵州“村超”的研究主要从知识发酵理论 [8]、情感传播理论 [9]、嵌入性理论 [10]、互动仪式链理论 [11]、身份建构与最优区分理论 [12]等视角分析其火爆原因, 以政府为核心主体可归因为利益动员、情感联结、信息传播三大维度。然而, 上述研究多从单一维度展开, 对不同维度间的协同演化机制尚缺乏深入探讨。同时, 上述研究多停留在贵州“村超”的生成传播机制研究, 对其之于乡村振兴的影响意义缺乏更进一步的挖掘。资源动员理论以其较强的理论综合能力为解决上述局限提供了理论可能。但是, 目前的资源动员理论通常作为研究集体抗争事件的重要视角, 对社会运动以外的分析研究尚不充分, 难以直接为本文研究问题的解决提供指导。

综上所述, 本文聚焦“现象级文旅火爆如何助力乡村韧性提升”这一核心问题, 通过将资源动员理论置于中国语境下搭建分析框架, 结合贵州“村超”案例, 力图揭示乡村通过现象级文旅事件的火爆出圈带动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

1. 文献综述

资源动员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是研究当代社会运动现象的重要视角之一。在资源动员理论中，资源是核心，动员则作为实现组织目标的概念化过程。其中，资源既包括有形的物质资源（如资金、设施）、人力资源（如领导者、参与者）等，也包括无形的符号资源（如话语、合法性）与文化资源（如价值观、认同）等，具有包含个体、组织、网络在内的嵌套性特点；而动员则是旨在通过组织化手段将潜在资源转化为集体行动的实际效能，最终服务于社会运动组织的目标实现 [13, 14]。换言之，资源动员理论展现了一个组织从被动的个体集合主动转变为公共生活参与者的过程 [15]。

早期的资源动员理论经历了从非理性假设向理性假设、从个体层次向人际网络、从社会运动与政治权力二元对立向相互联结的三重转变。其一，基于“成本—收益的权衡是集体行动的核心”这一理论假设 [16]，学界提出“社会运动是人们对资源动员理性选择的结果”这一观点 [13, 17]，颠覆了传统社会运动理论的非理性假设。其二，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资源动员不仅是一个行动动员的过程，更是一个通过建构成员间的共同参与意义来实现共识动员的过程 [18]。这表明，单凭自身利益不足以解释社会运动对追求集体利益的努力贡献 [19]，信任建构才是资源动员中最重要的问题 [20]，由此实现了从个体利益诱因到人际动员网络的讨论转向。其三，早期社会运动理论常将社会运动与政治权力视为对立关系，认为国家是社会运动的压制性力量 [15]。然而，资源动员理论通过引入“政治机会结构”的概念，揭示了社会运动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动态联结 [21]。这一转向的核心在于认识到社会运动不仅是反抗政治权力的主体，也可能通过策略性互动与制度性嵌入重塑权力关系 [22]。

而在资源动员理论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资源动员和动员背景两大研究方向，前者认为资源总量的大小及其组织化程度是决定社会运动成败的关键，后者则补充了社会运动的动员背景这一同等重要的影响因素 [23]。可以联系地认为，资源的组织化过程也是其适应环境变化并强化竞争优势的过程 [24]。伴随社会建构论的发展，石大建和李向平（2009）总结出资源动员、成员动员、框架动员三个新的研究维度，使资源动员理论具有更好的解释力 [25]。然而，尽管资源动员理论在不断地完善，但其不可避免存在一些研究局限。从本体论层面看，资源动员理论的结构功能主义倾向将社会运动简化为资源输入与动员输出的线性过程，遮蔽了能动主体对资源动态建构与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从目的论层面看，资源动员理论以理性选择为立论假设，忽视了可能发挥重要作用的非理性因素，存在运动绩效导向下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消解可能。从方法论层面看，由于其主要在微观层面对制度化、组织化的社会运动进行单案例研究，所以它既难以探讨草根群体自组织化社会运动的微观机制，也难以捕捉宏观条件背景下跨组织间的多案例互动联系，例如本文所针对的现象级文旅火爆事件。

更为关键地是，从认识论层面看，资源动员不应只是成为西方社会研究社会运动的专利。至少在中国情境下，中国社会为资源动员理论突破研究局限、实现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生命力。在我国，通过政治动员进行国家治理是一个十分突出的政治现象 [26]，并对民众的国家认同有重要影响 [27]。在政府组织内部，运动式治理 [26]、动员式治理 [28] 等模式独具特色。而在对外处理与市场、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政府动员的前置地位也极为突出，如政府调控下的金融市场动员性扩张 [29]，以及应急社会动员 [30, 31]、扶贫社会动员 [32, 33] 等国家主导下的社会动员。通常情况下，政治动员在我国的市场动员、社会动员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中国式动员的重要特征。近年来，我国逐步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并进一步加强社会的活力与自主性，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正在重构。

本文认为，资源动员理论不必仅限于研究社会动员，政治动员、市场动员也同样适用；也不必仅限于研究社会运动，国家治理、市场发展也同样可行。它不应成为一个狭隘的研究视角，而理应成长为一个包容的研究范式。这一观点与我国现实国情高度契合，不仅开辟了资源动员理论新的研究视角，也为本文研究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窗口。

2. 方法选择

2.1. 方法选择

本文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探讨现象级文旅事件火爆出圈的生成传播机制。首先，本文以归纳式的单案例研究方法为核心，通过观察现象、提炼数据、分析关键情境和事件，从经验事实中抽象理论命题，进而深入回答“村超”火爆背后复杂的过程机理，有助于举一反三为同类型事件提供一个较为契合的理论模型。其次，突破既有框架的洞见、对优秀理论的检验以及令人信服的证据是开展此类研究的关键标准 [34]。本文以演绎式逻辑推理为补充，通过以资源动员理论为初始化理论模型，并基于中国本土情境赋予其重新概念化的过程，重新定义了资源的能动主体与动员维度，使其既保留了经典理论的解释力，又通过本土情境扩展其适用性，符合学界对理论创新的期待。

2.2. 案例选择

本文选择贵州“村超”事件作为案例研究对象。2023年5月13日至7月29日，榕江县举办的榕江（三宝侗寨）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火爆出圈。截止到2023年8月1日，贵州“村超”的全网流量已超300亿。在这两个月里，榕江县依托贵州“村超”这一特色文化IP，将当地民族文化与体育生活相结合，成功吸引游客338.42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8.34亿元，不仅带动了吃、住、行和娱乐等产业的全面振兴，更提升了本地民众乃至全民族的文化自信。有关贵州“村超”发展的时间进程主要如表1所示。

表1 贵州“村超”发展的时间历程

阶段	时间	事件
历史积淀期	1950—1988年	榕江中学兴起足球运动，并逐步扩展至政府机关及各村村民。
	1990—2000年	榕江足球协会成立，村民自发组织各类“村赛”，是谓贵州“村超”前身。
	1950—2022年	榕江校园足球队在省、州级赛事中累计获得50余项奖牌，2018年被央视报道，2021年被评为“全国县域足球典型县”。
出圈红利期	2012—2021年	榕江车江三宝侗寨乡村足球超级联赛引发全网关注，赛事策划人提出“村超”概念并推动IP打造。
	2023年1月24日	榕江车江三宝侗寨乡村足球超级联赛引发全网关注，赛事策划人提出“村超”概念并推动IP打造。
	2023年5月13日—7月29日	首届村超比赛“贵州榕江（三宝侗寨）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成功举办。
2023—2024年	2023年9月2日	贵州“村超”与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英超）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024年1月6日—7月20日	成功举办2024年赛季“村超”及首届“班超”，并开展多场国际友谊赛，“村超—班超”双线培养体系加快形成。
未来开拓期	2025年3月—8月	首届“村超”全国赛举办在即。

2.3. 数据采集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二手数据和一手数据两个方面。首先，受制于地域限制，本文以二手数据为主。通过以“村超”等关键词进行网络检索，整理了包括人民网、贵州省及榕江县政府官网等权威媒体发布的有关资料，并通过知乎、微博、抖音等自媒体内容创作平台补充案例相关的其他信息。其次，对二手数据进行初步分析、提炼与思考，结合问题盲点，前往榕江并对1位政府工作人员、2位“村超”活动参与者、4位当地百姓以及3位外地游客共10位访谈对象进行访谈，总时常约为200分钟。本文主要数据来源如表2所示。

表2 本文主要数据来源

数据类型	数据来源	数量	时长	访谈编码
二手资料	新闻网站与政府官网	20	—	G1—G20
	自媒体内容创作平台	8	—	T1—T8
一手资料	政府工作人员	1人	40分钟	F1
	“村超”活动参与者	2人	60分钟	F2—F3
	当地百姓	4人	80分钟	F4—F7
	外地游客	3人	20分钟	F8—F10

2.4. 数据分析

本文采取过程追踪法对数据进行初步分析。过程追踪法作为质性研究中的因果机制分析方法，旨在通过深入的案例研究，分析过程如何作用于结果来揭示因果关系的生成逻辑 [35, 36]，尤其适用于解释复杂社会现象中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过程 [37]。结合理论检验型、理论构建型和结果解释型三大分类 [38]，本文参照理论构建型为研究思路，通过对案例因果过程进行一定程度的理论化 [39]，采用“数据—关系—框架”的循证思路不断对该模型进行修正、完善，最终构建一个如图1所示的分析框架。其中，政治动员为始发动力机制，利益动员、情感动员、教育动员为过程机理，文化动员为结果呈现机制，它们共同作用于贵州“村超”的火爆结果。同时从韧性的概念出发，参考苏毅清和张诗斐的研究 [40]，本文提炼出资源、参与和认同三个衡量乡村韧性的维度。其中，资源是乡村能够获得韧性的物质基础，参与和认同体现人们围绕资源使用所开

展的互动，三者共同确保了人们能够通过随时调整资源使用的规则来应对外部变化，最终实现对于生存情况和发展水平的维持。最后，资源动员的全过程都置于实体空间与媒介环境中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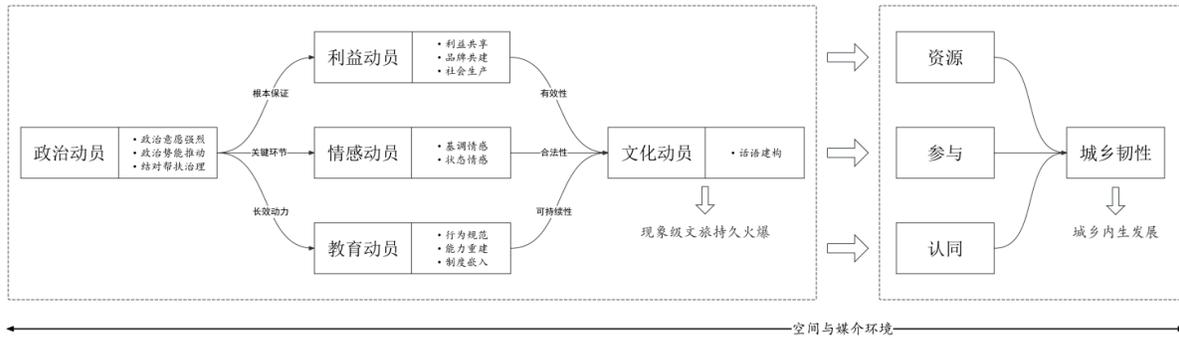


图1 分析框架

3. 案例呈现

3.1. 政治动员

在政治动员中，通常以政府为主体，由政府出台相应公共政策引导基层组织及群众力量推动乡村治理，促进乡村振兴。通常情况下，县级政府的政治意愿与机构能力是决定公共政策或其他某项工作顺利推进的关键 [41]。这其中包含了两个要素，一是政治意愿，二是政治能力。首先，强烈的政治意愿与重大政策的制定实施呈显著正相关 [42]。同时，为充分调动政府各层级的政治意愿与政治能力，以高位推动为典型特征的政治势能配合相应的激励机制构成了政策执行的主要手段 [43]。在本案例中，无论是贵州省委宣传部还是榕江县政府各级部门，均将“村超”视为把握发展机遇、树立良好形象的重大机遇，各级政府部门想法一致，形成了强烈的政治意愿，这种意愿不仅存在于官方，也会下沉至基层，形成政府意志引导基层行动的局面。如榕江县政府凭借“村超”爆火不仅实现了官方意志与民众期待的和谐统一、强化了政治信任，更使得政治势能能够在各个环节转化为治理效能都显得尤为顺畅。与此同时，政府以粤助黔的“结对子”模式为榕江的能力均衡和潜在合作提供制度机会 [44]，形成“东部资源+西部场景”的创新组合。佛山作为榕江的对口帮扶城市，在提供1000万专项资金的同时引入华侨城集团参与景区开发，形成“制度性嵌入”的局面，极大提升了榕江县政府的资源整合能力，在“村超”流量转变为经济发展增量的过程中贡献了重要力量。

“我们自上而下对这次事情都高度重视，县长亲自主抓。省里调研组发表了《求是》文章，《光明日报》《央视新闻》《贵州日报》相继对我们进行了报道，我们做不好都不行。”（研究资料：F1）

“淄博烧烤做得那么好，我们也一样可以做好的。而且我们如果做差了，社会对我们的负面效果只会放大。”（研究资料：F2）

“村超最火的时候，我们几乎从早到晚都不闲着。领导在线指挥，各部门、村民大家都很积极配合，努力为大家带来好的体验。”（研究资料：F3）

总体而言，政治动员贯穿“村超”爆火的全过程，并由运动式治理逐渐转化为常规治理，使得政府以更加成熟的治理能力为公众提供更好服务。然而，“村超”持久火爆绝非仅靠政治动员，它也取决于能否回应社会参与的愿景与诉求 [45]。只有充分激发起社会的即时行动与长效认同，才能实现“村超”的持久火爆而非热度的转瞬即逝。因此，政治动员仅能作为火爆的始发机制，其过程机理与核心效用在于推动实现了利益动员、情感动员与教育动员的三重联结。

3.2. 过程机理

首先，利益动员是资源动员的根本保证。利益动员作为资源动员的底层逻辑，其核心在于通过政策激励与资源再分配，将分散的个体利益诉求转化为集体行动的经济动能，强调理性行动者如何通过组织化手段获取资源以实现目标 [17]。区别于西方社会运动中利益动员的对抗性特征，“村超”情境下由政府主导的利益动员展现出独特优势，政府通过协调市场与社会网络 [46]，能够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与利益再分配 [47]。政府以“村超”为核心，加快构建“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产业生态，通过公共平台促进中小微企业集群化发展，将利益动员从零和博弈转向共生发展。此外，榕江县政府将经济行动嵌入社会关系网络，与周边县市政府合作互利，通过跨县域“超经济圈”发展模式建设共享文旅资源。截至2024年11月1日，榕江县累计接待游客870.42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00.98亿元。与此同时，政府也为市场、社会参与创造了机会窗口。一方

面，市场机制被嵌入公共事务中，“村超”与英超联盟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与汇源集团、华诚生物等几十家企业达成品牌合作，深度锁定长期资本。企业则通过赞助赛事、开发衍生产品等方式获得品牌溢价，从而反哺公共事务，由此实现品牌建设的双向价值增值。“村超”联合黔东南州打造非遗产品联合展销平台，开发非遗文创产品450余种，衍生足球产品250余种，2024年榕江县非遗衍生品销售额已达1600万元。另一方面，“村超”的定位在于群众主办、全民共享，通过赋权给予村民“可行能力”，提升个体参与经济活动的自主性[48]。本地村民既是球员、啦啦队员，也是摊主、民宿经营者，以多重身份参与产业链，使内生动力被充分激发。自2024年以来，榕江县新增餐饮业市场主体1179家，床位数从5958个增长至11000多个，餐饮、住宿营收超15亿元。综上，利益动员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不仅体现在经济维度，更通过“村超”品牌管理公司将部分收益反哺村集体经济，激活传统社会网络的生产性功能。

“这个事儿对谁都是一件好事。政府领导们有了政绩，他们肯定开心。很多企业也都来寻找商机，各种各样的人都过来，他们来就是为了赚钱的，当然也给我们带来效益。这是一件共赢的事儿。”（研究资料：F4）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把我们家在外地的亲戚都叫回来了。去那边摆个摊、卖个东西、还有那个什么直播，都能赚不少钱。现在你每天随便干点都能挣个大几百，比以前强太多了。这样干，又开心，又有劲儿。”（研究资料：F6）

其次，情感动员是资源动员的关键环节。情感动员通过基调情感与状态情感间的叠加效应[49]，将工具理性导向的利益联结升华为价值理性驱动的“情感共同体”，从而使个体或群体通过情感表达，在持续互动中唤起、激起或者改变对方对事物认知、态度和评价。在新冠疫情期间形成的“压抑型”情感结构、中国男足在国际赛事中的持续失利以及本土民众远走他乡的情感氛围交织下，民众逐渐形成了以压抑、乡愁为基础的基调感情，而“村超”的爆火恰逢其时地激活了“状态情感”转换。通过数亿人线上线下实时互动引发的活力文化、草根足球狂欢式展演呈现的足球文化、侗族大歌与苗族锦鸡舞构建的民族文化等文化符号唤醒了民众内心深处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从而进入一种以释放、回归为表征的状态情感。据榕江县政府公开数据显示，全县38.5万人口中有近5万人具备足球技能，形成足球全民参与的壮观场景，因此，当地人集体踢足球的仪式通过情感能量的聚集使社会秩序重构，将普通的小型足球比赛发展成为全国知名的“村超”联赛。此外，情感动员能够通过对媒介传播内容进行策略化运作，以情感作为工具，从而达到扩大影响力及情感共同体凝结的目的。据统计，2023年“村超”全网综合浏览量突破600亿次，全网在线观看人数超6亿人次，村超话题在微博创下72.5亿阅读量，创造了群众“数字乡愁”情感共振的同时，还使地方性实践升华为乡村振兴的国家叙事。由于集体情感具有社会整合的作用[50]，在数字社交媒介的共景传播和仪式化生产作用下，个人对于群体身份产生情感共鸣和归属感，从而使民众产生共意行动[51]。这种具有政治属性的情感动员以“趋近完美”的特质吸引民众前来，通过共同关注、节奏连带，使个体情感向群体共识凝聚转变，形成群体团结[52]，甚至建构了一种非理性的政治认同。在这一过程中，民众将国家拉回到日常实践中[53]，并维系了“村超”火爆的合法性。因此，这种情感动员机制重塑了乡村社会的组织形态，其核心在于当工具理性遭遇发展瓶颈时，价值理性驱动的情感共同体建构，能够激活最深层的文化基因，实现社会整合的创造性转化。

“虽说无利不起早，但我觉得情感也很重要。就是村超把大家的情绪都调动起来了，我们也想来亲身体验一下、释放一下。”（研究资料：F10）

“这个事情背后一定是有国家在推动，要不然村超不可能火成这样，而且负面舆论处理得如此迅速。不过另外一方面，村超火成这样，国家要不想让它火，也不一定能压得住。”（研究资料：F7）

最后，教育动员是资源动员的长效动力。教育动员通过行为规范、能力重建与制度嵌入，实现了人力资本的规训与长效累积。在行为规范方面，政府通过制定明确的赛事规则与公共参与规范，将乡土社会的非正式习惯转化为正式的制度准则，形成一个道德示范场域。置身于道德场域中的示范客体人群，在深受道德规范和道德理想的规训下，就会建构一种基于共同认知的道德观的社会秩序，激发群众形成自发维护集体利益的价值理念。这种价值观逐步内化为一种集体道德标准，实现了对越界行为的合法愤怒[11]。在能力重建方面，“村超”带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和实际效益，以赛促学、以学促产的局面正在加快形成。以“村超”为核心的文化社区群系也在逐步建立，村民们通过对整合利用各社区资源并提升社区资源链接能力，打造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不仅激发了村民的自我发展意愿，更增强了大家参与社会变革的能力。在制度嵌入方面，“村超—班超”双轨制设计将代表标准化的理性主义和国家统一行动的意志嵌入村庄的足球文化生态，完成了“村超”文化代际传递的“闭环”，既实现了“村超”的文化再生产，又形塑了教育与产业深度耦合的社会发展生态。通过认知、能力与制度层层递进，将文旅事件的外源性关注逐渐转化为内源性发展动力，并最终在村集体内塑造了新的社会化模式及行为模式[54]。

“大家做事情都比较自觉，基本不会也不敢给村超抹黑。”（研究资料：F5）

“教育最重要，现在孩子们都在接受足球教育。未来有他们在，我们的村超文化不会丢。就是希望这个热度可以再持久一点。”（研究资料：F2）

3.3. 文化动员

文化作为共享符号系统，通过仪式、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维系社区凝聚力，是集体行动的重要资源 [55]。而文化动员是集体行动组织者如何将各种文化符号要素实质化为有效资源的过程，是实现集体行动动员的最后一步 [56]。

本文则认为，文化动员本质是一个话语建构的过程，通过话语的生产、传播与制度化，将离散的、非正式的文化实践转化为正式制度的意义体系，进而使贵州“村超”具备恒久发展的可能。从话语生产维度看，以“村超”为载体将苗侗民族文化与足球竞技精神深度融合，并与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中华民族共同体等国家话语精准对接，构建了一个“国家在场”的叙事景观，不仅实现了对本土足球文化、民族文化的符号化转译，更完成了对本土村民的主体身份重构，进而塑造出一个集体行动的意义框架。从话语传播维度看，政府、媒体与民众共同构建了一个“媒介仪式空间” [51]，形成一个网络扩散生态。官方媒体通过议程设置突出“人民主体性”与“文化自信”叙事，将“村超”纳入政治文化话语体系。自媒体则通过平台算法推荐与草根自发创作形成互补张力，使“真实在场”的情感叙事激发话语共鸣。与此同时，算法推荐机制成为话语再生产的隐形推手，抖音、微博等平台通过“村超+”的标签组合，推动“村超”实现跨圈层传播与意义交集。从话语制度化层面看，通过设立周期性“村超”比赛等形式，完成对“村超”的仪式固化与文化再生产。同时将“村超”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实现制度吸纳。最终，文化动员将临时性事件关注转化为地方性文化资本再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共识，使“村超”具有持久广泛的影响力。由此可见，“村超”文化动员的成功，关键在于其通过上述话语建构过程，成功地将足球文化、民族文化与国家话语与个体理念深度融合，最终转化为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社会共识与价值认同。

3.4. 结论

综上所述，贵州“村超”的爆火并非政府、市场或社会单一主体主导的结果，而是三者通过资源动员的协同演化形成的治理跃迁过程。榕江县政府以政治动员为起点，强烈的政治意愿与政治势能充作始发动力，通过利益共享、品牌共建、社会生产的利益动员，基于基调情感与状态情感叠加演化的情感动员，以及行为规范、能力重建与制度嵌入的教育动员，共同促成以话语建构为本质特征的文化动员，从而使得贵州“村超”此类现象级文旅事件得以持久火爆出圈。而在对各类主体的动员过程中，贵州“村超”集聚了优质资源、激活了参与动能、强化了文化认同，而火爆的持久性则进一步强化了动员的效果与效能。在物质空间层面，通过提高治理水平进一步提升了基础设施的弹性使用与场所承载力；在社会空间层面，重构了政府—市场—社会的互动网络；在象征空间层面，重塑了乡村认同的集体表征。这种多维空间重构有效提升了乡村韧性水平，同时媒介传播扩大了这种韧性效应，为乡村振兴注入了长效发展活力。

4. 结语

总体而言，现象级文旅事件的兴起折射出中国国社关系、城乡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在共同富裕目标的指引下，乡村振兴不再是简单的资源输送，而是要通过文化认同与价值共创，共建城乡命运共同体。“村超”的成功实践表明，当乡村不再是城市发展的附属品，而是具有自主性的文化主体时，城乡融合发展才真正具备了可持续的内生动力。这一过程不仅巩固了乡村政权的治理韧性，更激活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的动能。

从理论层面来看，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其一，本文提出，现象级文旅火爆不仅是一个品牌建设的过程，更是一个话语建构的过程，这是决定其火爆持久性的根本因素。其二，本文不仅在新的情境中展现了政治动员在中国语境下的独特地位，更尝试突破资源动员理论在传统社会运动研究中的对抗性预设，揭示了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协作的资源整合机制，拓展了该理论在非抗争性集体行动中的解释边界；其三，通过构建一个资源动员理论模型，阐明了现象级文旅事件从短期爆发到长效转化的内在逻辑，弥补了既有研究对多维度协同机制关注不足的缺陷，同时为转型社会中的乡村韧性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

而在实践层面，贵州“村超”案例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益启示。首先，它证明了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现实可行性。通过足球运动与民族文化的创新融合，“村超”激活了乡村沉睡的文化资源，创造了“体育+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模式。其次，它展现了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新路径。“村超”期间，不仅城市消费力下乡带动了乡村经济发展，乡村文化也反向输入城市，形塑了城乡之间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共鸣。最后，它提供了乡村韧性治理的创新样本。榕江县政府积极落实服务型政府理念，在保持乡村主体性的同时实现了有效引导，为平衡政府主导与民间活力提供了重要参考。

最后，本研究也存在若干局限。首先，单案例研究虽然能够深入剖析贵州“村超”提升乡村韧性水平的作用机制，但在结论的普适性上存在局限，未来可通过多案例比较增强理论解释力。其次，对数字技术在动

员过程中的作用分析不够深入，算法推荐、社交媒体等新型动员工具值得专门探讨。最后，对文化资本转化的长期跟踪不足，“村超”效应能否持续带动乡村振兴仍需后续研究验证。

致谢

感谢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府公共关系学》主讲教师吕忠助理教授对本文的支持，感谢第五届中国政治学本科生学术研讨会袁方成教授、李昂编辑对本文的宝贵建议。

基金项目

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圳通畅，源自真好洋’本科生创新团队建设”（806-0000340321）

深圳大学团员与青年发展研究计划课题“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投身绿色低碳产业的政策驱动与协同发展研究”（2025YB16）

参考文献

- [1] 王露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振兴与伦理重建[J].中国社会科学, 2021(12): 89-109+201.
- [2] 叶兴庆.迈向2035年的中国乡村: 愿景、挑战与策略[J].管理世界, 2021, 37(4): 98-112.
- [3] 王薇然, 杜海峰.基于多元治理主体的乡村韧性比较研究[J].公共行政评论, 2021, 14(4): 4-24+196.
- [4] 粟后发.乡土韧性与城乡回路: 精英反哺的社会文化动因及影响[J].社会学评论, 2022, 10(4): 204-221.
- [5] 陈军亚.韧性小农: 历史延续与现代转换——中国小农户的生命力及自主责任机制[J].中国社会科学, 2019(12): 82-99+201.
- [6] 吴业苗.韧性乡村: 当代流变与国家建构——兼论城镇化中的民生安全[J].社会科学, 2023(9): 137-151.
- [7] 郭晓鸣, 吕卓凡, 周小娟.整体性治理与乡村韧性发展: 一个“四维”理论分析框架[J].社会科学研究, 2024(4): 13-22.
- [8] 刘海涛, 周晓旭, 王宜馨.贵州“村超”现象级传播的生成逻辑与传播效应——基于知识发酵理论的视角[J].体育与科学, 2023, 44(5): 15-21.DOI: 10.13598/j.issn1004-4590.2023.05.003.
- [9] ZHANG J, DAI G. Unveiling Emotional Dissemination in Hotspot Events: “Village Super League” Case Study [C]//2023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g Data and Social Sciences (ICBDSS 2023). Atlantis Press, 2023: 386-397.
- [10] WANG Q, FUCHS S, BODET G. Elite versus grassroots sports events sponsorship in China: an exploration of sponsors' motives and objectiv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s Marketing and Sponsorship, 2024, 25(3): 465-482.
- [11] 田兵兵, 辜德宏, 曾庆为.互动仪式链理论视域下乡村体育赛事可持续发展的审思——以贵州“村超”为例[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24, 58(12): 40-47.
- [12] 王泽宇, 周翔, 王增文, 等.乡村品牌身份重构如何助力乡村振兴? ——基于贵州“村超”的探索性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 2025, 41(3): 93-113.
- [13] MCCARTHY J D, ZALD M N. The trend of social movements in America: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J]. 1977.
- [14] EDWARDS B, MCCARTHY J D. Resources and social movement mobilization [J].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movements, 2004: 116-152.
- [15] TILLY C.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M]//Collective violence, contentious politics, and social change. Routledge, 2017: 71-91.
- [16] OLSON JR M.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with a new preface and appendix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17] MCCARTHY J D, ZALD M N.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7, 82(6): 1212-1241.
- [18] KLANDERMANS B.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rotest and multiorganizational fields [J]. 1992.
- [19] MCCARTHY J D, ZALD M N. The enduring vitality of the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of social movements [M]//Handbook of sociological theory. Boston, MA: Springer US, 2001: 533-565.

- [20] 章友德,周松青.资源动员与网络中的民间救助[J].社会,2007(3): 70-91+207.DOI: 10.15992/j.cnki.31-1123/c.2007.03.004.
- [21] MCADAM D.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 [22] TARROW S. Power in movement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 [23] 冯士政.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 [24] 董保宝,葛宝山,王侃.资源整合过程、动态能力与竞争优势:机理与路径[J].管理世界,2011(3): 92-101.
- [25] 石大建,李向平.资源动员理论及其研究维度[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5(6): 22-26.
- [26] 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J].开放时代,2012(9): 105-125.
- [27] 方志远.“冠带乘身”与明代国家动员——以正统至天顺年间赈灾助饷为中心[J].中国社会科学,2013(12): 136-157+207.
- [28] 赖诗攀.国家动员及其效果:以反腐败为例[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9(1): 13-20.
- [29]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张平,刘霞辉,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从动员性扩张向市场配置的转变[J].经济研究,2007(4): 4-17.
- [30] 樊佩佩,曾盛红.动员视域下的“内生性权责困境”——以“5·12”汶川地震中的基层救灾治理为例[J].社会学研究,2014,29(1): 125-147+244.
- [31] 郝晓宁,薄涛.突发事件应急社会动员机制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0(7): 62-66.
- [32] 符平,卢飞.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脱贫攻坚的组织动员[J].社会学研究,2021,36(3): 1-22+225.
- [33] 彭小兵,谭志恒.组织动员、资源内生和市场对接:贫困社区内源发展路径——基于云南省L中心的考察[J].中国行政管理,2018(6): 61-67.
- [34] EISENHARDT K M. 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9, 14(4): 532-550.
- [35] Process tracing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 [36] GEORGE A L, BENNETT A.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M]. mit Press, 2005.
- [37] A handbook of process tracing methods [M].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19.
- [38] COLLIER D. Understanding process tracing [J].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2011, 44(4): 823-830.
- [39] BEACH D. Process tracing methods [M]//Handbuch methoden der politikwissenschaft. Springer VS, Wiesbaden, 2018: 1-21.
- [40] 苏毅清,张诗斐.驻村第一书记促进乡村内生发展的社会资本逻辑——基于广西大水村的个案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25,22(1): 139-150+175.
- [41] 张广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如何才能真正受益——基于县级政府政治意愿与能力的实证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08(10): 72-75.
- [42] SHEN, SHIRAN VICTORIA, “Political will as a source of policy innovation”, Policy Studies Journal, Vol.53, no. 1 (Feb 2024), pp. 185-200.
- [43] 贺东航,孔繁斌.中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治势能——基于近20年农村林改政策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9(4): 4-25+204.
- [44] 叶敏,曹璐琼.有组织的合作:中国特色的结对治理机制[J].政治学研究,2024(4): 131-143+190.
- [45] 张彦青.基于“政治动员—社会回应”模型的国家荣誉制度探析[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5(1): 36-43.
- [46]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3): 481-510.
- [47] EVANS P B.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 [48] CLARK D. The Capability Approach: Its Development, Critiques and Recent Advances [J]. 2005.
- [49] 袁光锋.公共舆论中的“情感”政治:一个分析框架[J].南京社会科学,2018(2): 105-111.
- [50] DURKHEIM E.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M]//Social Stratification, Class, Race, and Gender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Second Edition. Routledge, 2019: 178-183.
- [51] 罗坤瑾,刘艳莎.乡村体育赛事的群体情感动员及空间仪式化生产[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33(2): 101-112.

- [52] COLIINS R.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M]//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 [53] 高飞.梯度情感动员的双重过程: 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中的递进逻辑 [J].中国行政管理, 2022(4): 55-62.
- [54] S·N·艾森斯塔德. 现代化: 抗拒与变迁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年.
- [55] CHANG M C Y, LEE P Y, YANG A H. Cultural mobilization in reinvigorating the rural society in Taiwan: the case of the Wanbao community [J]. The Anthropologist, 2015, 22(1): 89-100.
- [56] 魏海涛.集体行动的形成: 一个文化视角的理论模型 [J].社会学评论, 2019, 7(4): 75-87.